



知识分子的师道传承

“先生经常说，我们首先要做个好人，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。他认为，如果你人品好，做人好，学问也有可能做得好。学术成就在于个人造诣，但做人是一个普遍要求。先生在评判文学史上的人物与评判他周围的人时，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。”

□ 记者 | 王 煜

“**师**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”在韩愈千百年前的经典论断里，“授业”过程中是否“传道”，“传道”过程中是否“解惑”，是衡量“师道”得失的标准。

古之“授业”，相当于今之“教书”；古之“传道”“解惑”，相当于今之“育人”，发展学生健全的人格，传承社会核心价值观念与知识分子的风骨。我们从大师的师生故事里，可以切身感受到人文精神的流淌与延续。

言传身教里的人文精神

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级教授、文科资深教

授陈思和，是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后第一届考生。在他的记忆里，除了在复旦学习时接触的现代文学专业蕴藏的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，当时他还得到很重要的人文教育，就是导师的言传身教。贾植芳这样的人生导师，直接引导了他对现代知识分子道路的自觉实践。

“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师生间的交流传承的。”陈思和向《新民周刊》记者表示。

1978年，陈思和刚刚进入复旦大学学习时，就认识了贾植芳。当时后者还没有平反，在中文系资料室做资料员。“先生精通日语、英语，他从国外买了一大批书，包括国外学者研究巴金的书，他看到我们经常去资料室，问我们愿不愿意看这些资料。我们说愿意，他就把书拆散、复印后给我们，我们读完后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翻